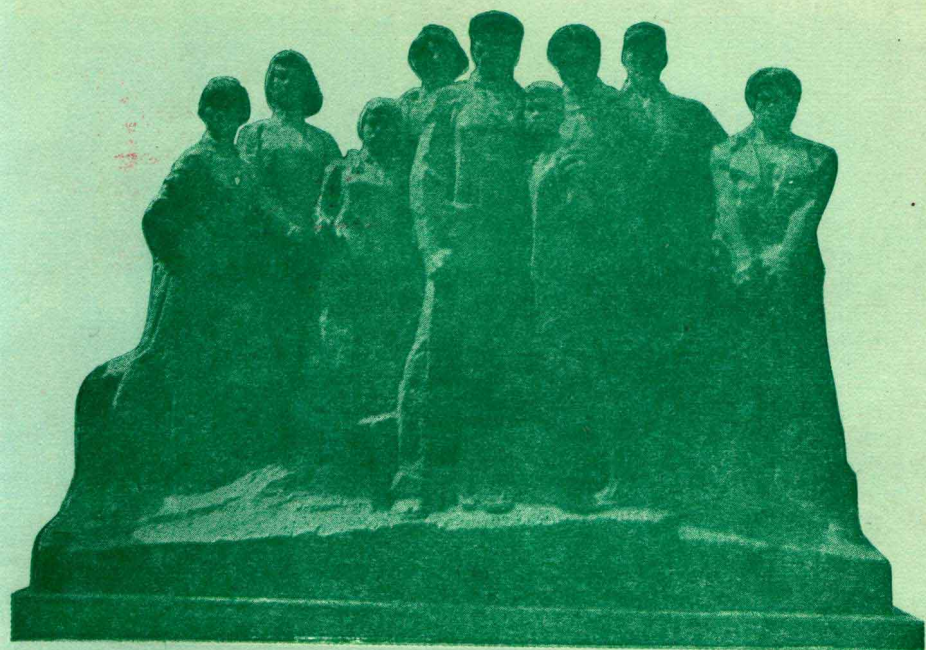




5

南京党史資料

NANJINGDANGSHIZILIAO

南京党史资料

第五辑

人民财产，注意爱护，
遵守纪律，按期归还。

南京工学院

分类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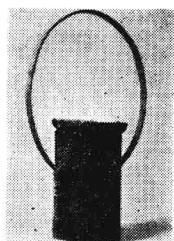
登录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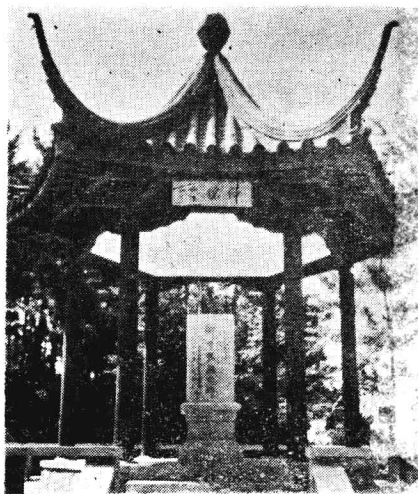
邓 仲 铭



张 智 锦



邓仲铭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油灯
和手枪。



一九八三年江宁县人民为纪念
仲铭烈士牺牲四十周年，建“仲铭亭”
东山镇竹山西北山腰，江渭清同志为
亭题字。

目 录

党在我们工人中间

- 早期南京工人斗争琐忆……………何正泉(1)

中共江和全工委的建立和工作

- ……………中共江浦县委党史办公室(12)

- 抗战时期高淳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李代胜(20)

- 战斗在江南敌后……………毛英奇(24)

- 华中铁道工人抗日行动委员会……………李佩山(32)

- 抗战时期的南京“学生互助会”……………潘 田(39)

- 在汪伪统治中心利用合法组织开展青年工作……………叶再生(48)

- 忆“南京工商青年联谊会”的一些活动……………陈 淦(59)

- 汪伪警卫第三师反正经过……………韩贤俊 吴树山(63)

- 俞渤等五人驾机起义纪实……………曹昭云(76)

悼邓振询同志.....曾 山(82)

邓仲铭同志简历.....中共江宁县委党史办公室(85)

革命烈士小传

费明龙烈士.....中共江宁县委党史办公室(87)

张智锦烈士.....中共江浦县委党史办公室(90)

邹 毅烈士.....中共溧水县委党史办公室(93)

贺飞霞烈士.....中共六合县委党史办公室(97)

党在我们工人中间

——早期南京工人斗争琐忆

何 正 泉

一九一〇年，我出生于江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幼年时期，军阀混战，加上连年灾荒，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啼饥号寒，流离失所。我父亲何嗣敬带着我们一家沿途要饭，经安徽来到了南京，住在城南宝塔山二号。父亲先后在金陵机器局、和记洋行做工，母亲帮人家做衣做鞋，我和姐姐、哥哥天天外出拾柴火、菜边，后来到和记蛋厂做临时工，一家过着穷困的生活。由于军阀打仗，兵工厂大量招收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一九二四年，我经工人袁振国介绍，顶了离厂工人滕炳炎的名字，到金陵机器局制弹厂当了工人。我每天披着麻袋片从清晨六点干到深夜，没有节假日，一月工资只有三元四角钱。如狼似虎的工头日夜监视着我们，稍不如意就打骂，罚工钱，关禁闭。

一九二六年起，象是有一股春风吹到了我们中间，茶楼酒肆里，人们谈论着“北伐”、“革命”这些新名词，工人们在厂里也偷偷传说着革命军就要打来了。什么是北伐，什么是革命军，我当时弄不清楚，只是听说革命军来了以后，工人不失业，不受工

头压迫，能吃饱肚子，就暗地里天天盼望着革命军早日打到南京。

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城战火纷飞，枪声大作，厂方将我们关在厂里，硬逼着替他们赶造军火。二十四日，北伐军打败了直鲁联军，攻进了南京城，我们才得以出厂回家。当晚，在共产党员梁永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在老君庙召开工人大会，成立了金陵机器局工会，还组成了八十多人的纠察队。第二天上午，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一些工人的陪同下，来到厂门前召集工人开会（后来知道他们是文化震、陈安民等同志），他们讲了北伐的意义，宣传革命道理，要求我们参加北伐军领导的市总工会。不几天，在贡院街明远楼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南京二百多基层工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我看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带着笑意，大家兴奋地议论着，诉说着。在热烈的掌声中，会议宣布成立南京市总工会，文化震、陈安民、钟天樾、陈佣之、康静仁、姚家让等二十五人为总工会执行委员，其中大多是共产党员。

会后，许多工人上街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传遍了大街小巷。

市总工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每天，总工会门前都挤满了人，有工人、市民、农民……就连白发老人也来了，人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认为能到这儿走一趟都是光荣的。工会领导很关心我们纠察队员，经常教育我们；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委、共产党员刘少犹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话。这使我渐渐知道北伐军中有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我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一天，钟天樾问我：“家里有几个人？爸爸干

什么？在厂里拿多少钱？够不够吃？”我一一作了回答。钟说：“我们共青团也是没有钱的，共青团员不爱财，是爱国的。你愿意参加吗？”我说：“愿意”。这时文化震走了进来，钟天樾指着我对他说：“老文，我介绍他入团。”文化震笑着说：“欢迎，欢迎啊！”

我们的市总工会成立不多时，下关成立了受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南京市劳工总会，他们收买了许多流氓打手，与我们的工会对抗，到处破坏市总工会的声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金陵兵工厂工会会长姜金生在市总工会与文化震、姚家让谈话，我也在场。姜金生问：“到处出现伪工会（指劳工总会），怎么办？”姚家让回答：“派纠察队去查封。”姚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北伐军第六军发给市总工会的证书，接着说：“只有我们的市总工会才是合法的。”在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政治部的支持下，我们与伪工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管哪里出现伪工会，纠察队就去哪里查封。记得四象桥、淮清桥、保泰街等地方的伪工会，都是我们去查封的。纠察队负责人陈佣之还只身闯到下关伪劳工总会，不顾流氓打手的威胁，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许多受欺骗的工人群众，在陈佣之的教育下，脱离了伪劳工总会。同时，我们还封闭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组织的市党部、下关区党部。

蒋介石为了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群众，调走了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等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第二军，调来了何应钦的部队。四月初，蒋介石的亲信，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颁布条令：“未经公安局允许，禁止集会游行”。四月五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金陵大学召开全市党员大会，会上发给每人一个证，上面印有孙中山像和中国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的字样。何应钦到了会，省党部负责人侯绍裘、市党部负责人刘少犹作了报告。快散会时，一位代表在台上说：“市总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有集会的自由，公安局为什么要干涉我们？谁干涉我们，就打倒谁。”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到了珠宝廊市公安局门口时，停了下来，呼起口号：“打倒公安局！”“打倒温建刚！”在群众的怒吼声中，温建刚硬着头皮，装着一副笑脸出来了，工人们纷纷愤怒地责问他，温建刚理屈词穷，不得不向游行群众道歉，灰溜溜地缩了回去。

四月九日，市工会、农会、商会组织各界群众几万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庆祝北伐胜利，接着游行。我留在市总工会担任保卫工作。下午二点多钟，一帮警察、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我上前阻止，被他们狠狠打了一顿，关到一间屋里。暴徒们砸了桌椅，搜抢财物。我乘他们不注意逃了出来，在北伐军总司令部门口追上了游行队伍，向陈炯明报告了情况。温建刚正好在旁边，他威胁我：“你说话要负责哟。”我说：“我在总工会亲眼看到警察引着流氓冲进来，抢了工会财产，连我身上的钱、布胸章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说是奉了你的命令！”周围的群众马上喊了起来：“温建刚是反革命！”“打倒温建刚！”温建刚吓得跑进了总司令部，不出来了。与此同时，反动派还捣毁了我党力量占优势的国民党省市党部。

四月十日上午，南京群众在秀山公园举行肃清反动派大会。侯绍裘代表省党部讲话，要我们提高警惕，团结斗争，保卫革命果实。他谴责温建刚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总工会，拘捕工作人员的反革命罪行，要求惩办凶手，保护集会自由，保护工人运动。到会的人群情激昂，又到总司令部门口举行示威，工人纠

察队手持齐眉棍守住了东、西辕门，防止敌人破坏。群众不断高呼“肃清反革命！”等口号，工人们还唱起了《工人团结歌》。过了一会，总司令部大门口架起了四挺机枪，几百名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站在两旁，蒋介石戴着帽子、披着披风走了出来。他不着边际地说：“工人对北伐贡献很大，若无工人支援，北伐根本不能有今天，现在北伐尚未成功，成功后，我们可以经常会面谈谈。”群众不满意蒋介石虚伪的态度，队伍一直没散。

下午，温建刚布置上百名流氓打手，扛着“劳工总会”的白幡，挥舞着竹莞（读 dōu，指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茎），恶狼似地向群众扑来，从西辕门打到东辕门。工人纠察队发现了赶紧持棍迎上去。混战开始了。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在流氓打手的逼迫下，向东退去，两丈高的围墙都被挤倒，死伤数百群众。陈佣之一面用猎枪打倒了几个暴徒，一面指挥纠察队掩护群众撤退。总司令部门口，尸体横卧，血肉模糊，一片惨状。蒋介石终于撕掉了伪装革命的画皮，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

当晚，侯绍裘、刘少犹、文化震、钟天樾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正在进行时，公安局侦缉队包围了会场，除刘少犹逃脱外，其他同志都被捕了。反动派将他们杀害后，把尸体装在麻袋里，从通济门外九龙桥上扔到了河里。那几天，河面上经常漂浮着尸体，河水都染红了。

尽管当时形势险恶，反动派到处抓人，但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陈安民、陈佣之等同志还在暗中领导着我们工人。我们兵工厂的工会成员芦炳奎、于松涛、王明生等都是共产党员，会长姜金生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敢说敢做。在党员同志和广大工人支持下，姜会长拒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黄色市工会。五月，

姜会长曾领导我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厂长陈钦斗争，迫使他发还了克扣工人的工资。工会里有个工贼向陈钦报告，说工人要搞暴动，陈钦听到后非常害怕。一天，陈钦煞有介事地对姜会长说：“我在上海订好一批材料，已付了款，现在准备发货了，请你马上去检查一下。”姜会长信以为真，就坐着陈钦的汽车走了，刚过鼓楼，被埋伏的特务抓走。工人们得知后，在厂里包围了陈钦，要他交人。陈钦说：“大家放心，我发一份函，请工会干事送去，将姜会长接回来。”工会干事王明生、于松涛、芦炳奎、汪全铭拿着公函去珠宝廊公安局，结果又被扣押了。工人们气炸了，围住陈钦要揍他，被关同志的家属们也大哭大喊。陈钦吓得面无人色，答应马上将工人放回来。不到片刻，陈钦的小汽车将姜会长等五人接了回来，工人们给他们披红戴花，放起了鞭炮欢迎他们。谁知当天夜晚，侦缉队又出来抓人，工人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了芦炳奎、王明生、于松涛。姜金生、汪全铭没来得及通知，又被抓去。

那时和我保持联系的有陈安民、刘竹贤、姚家让、康静仁、车道明等。陈安民住在我家，常在我家里开会。后来，曾在市总工会当过纠察的造币厂工人张小二叛变了，他知道陈安民住城南一带，几次到兵工厂一带找他。一次乔盛亮碰见了张小二，张就向乔打听陈安民住哪里，乔不知道他是叛徒，答应下次带他去见陈安民。事后乔盛亮对我说了这一情况，我当时就批评了他，并说：“下次张小二来时，将他引到后山，我们杀了他。”此后张一直未露面。

不久，陈佣之也被捕了。陈是北方人，东南大学学生，身体非常结实，曾赤手空拳夺过北洋军的马匹、手枪。我们工人每游行，他都是总指挥。公安局侦缉队夜里从寓所里将陈佣之抓走

后，把他绑在一根栓马柱子上，用皮鞭、木棒拷打，要他招供。陈佃之同志坚贞不屈，被他们毒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壮烈牺牲了。

后来姚家让被捕，经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供出了一些同志。一天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指导员将我带到小洋楼上，拿出一张表要我填，我说不会写字，他说：“我教你写，写滕炳炎三个字。”我见情况不对头，马上说：“我不是滕炳炎，我叫何正义”。

“你在厂里不是叫滕炳炎吗？”

“我是顶滕炳炎的名字做工的。”

“那你就按顶的名字写。”

我填了姓名、年龄、住处、什么工作等，指导员又叫我写何时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不是滕炳炎，也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什么叫党。”

“有人证明你是共产党，你还想抵赖？”

“我只知道做工吃饭，别的什么也不懂。”

这时军警包围了我家，进行搜查，陈安民正巧不在，我家屋架上面还有几捆宣传品。但愚蠢的敌人搜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我被带到了厂政治部，反动派硬逼我承认是共产党，要我交出金陵兵工厂所有党员名单。他们越逼越紧，我始终不承认。几个打手将我吊了起来，用木棍打得我死去活来。当我昏迷过去时，他们便用凉水浇，用大香熏，我的前额给他们烧了一个疤，脸上被他们用刀划了个十字痕。由于我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毫无办法。厂里的工友们得到消息后也赶来了，纷纷说何正义是好人，他不是滕炳炎，我们愿意用性命保他。我这才被停止用刑，关进了禁闭室。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被捆绑着押送到公安局。经过我家门口时，父亲一看见我，就悲痛地扑在我身上，不肯让我走，军警用枪托把他打翻在地。我父亲又气又急，加上伤势严重，从此半身不遂。在公安局，我和姜金生、汪全铭关在一间牢房里。当天晚上，传我出庭。法官问我姓名，我始终咬定叫何正义，不叫滕炳炎。审讯毫无结果，退庭后又将我关进牢房。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公安局将我和康静仁、乔静清、郁阳元等六位难友押到了老虎桥监狱清党委员会。我们被打得遍体鳞伤，送到了病监。这里牢门不锁，可以散步，伙食稍好一点。当晚八点多钟传我们去出庭，首先喊：“滕炳炎。”我既不回答，也不动，法警硬将我拉上前。“你姓什么？”“姓何。”法官与左右嘀咕了几句，问了我一番后，又传讯了其他几个同志。过了几天，在一个上午，又传我出庭，法官让我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由姚家让辨认，我仍一口咬定不是滕炳炎。后来，敌人就没再审问我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从病监转到了南监，几十个人关在一间监房里，臭气熏天。每人手上脚上都套有铁环，用一根长木棒穿起，再用锁锁上，行动很不方便。这里关押的多是军政人员、学生，只有我是一个是工人，同志们都喊我“工人代表”。大家在牢监里成天谈被捕经过和斗争经验，研究在法庭上的对策，很担心敌人会对我们搞暗杀。大家讨论后决定一旦敌人来屠杀，我们就打穿墙壁逃跑。谁应付敌人，谁领导突围，我们都进行了分工。

一天上午又传我出庭，同时被传的有十几个人，法庭上喊一个人出来，很简单的问几句话，然后宣布开释，站在另一边。十几个人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审理完毕。我们回监房收拾一下，午饭

后都出狱了。

这时已经是八月了。我回家后，厂里许多工友来看我，对我表示同情。过了几天，我去保泰街看了康静仁、乔静清等同志。我被捕后工厂就把我开除了，释放回来没有工作。隔了几天，于松涛来找我，要我参加北伐军铁道队。铁道队属东路军何应钦领导，住在下关车站的几家旅馆里，队员多是铁路工人，既会开火车、修火车、修铁道，又会打仗埋地雷，是活动在铁道线上的重要力量。大队副姚佐堂是共产党员，在陇海铁路当过工人，参军后作战十分英勇，北伐中立了许多战功，左腿在战斗中被枪弹打跛了。铁道队下面的队长、队员大多是党员、团员。我被分配在三分队，队长姓刘。不久，姚佐堂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

在铁道队待了一个月，市委调我回城南区工作，罗世繁、车道明等常来和我联系。罗世繁多次在我家召开党的会议，有一次他说：“我们还保存了力量，眼前的挫折，和打仗一样有胜有败。我们不能被吓倒，要集中力量组织暴动”。大家听了情绪非常高昂。后来第六军一个小个子，自称是团员，主动找我联系，通知我一有暴动消息就干起来。我们曾在雨花台要塞看地形，我还通知了兵工厂卫队中我们的同志作好准备。但是暴动计划一直没有实行。

二七年十一月，省委派孙津川同志到南京进一步开展工作。孙津川同志在我家开了一次会，他说党要进行改组，要清除托洛茨基派，为了开展工作，南京城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宣布我为城南区支部书记。城南区支部的同志先后有何正仁、萱传宝、赵维泰、蒋才景、乔盛亮、陈春元、戴长福、夏长林、鲁纪亮、陈德友及三藏殿四个织布工人(两个姓刘)、城内东关头小

学孙老师等二十几个人。我们城南区支部按照上级要求，传达文件，布置工作，收集情报，发展党员，贴标语，散传单，反对国民党招兵。一次，伪市工会在体育场召开大会，事前我们用粉笔在各处写了标语，号召大家不要去开会。我们的工作鼓舞了工人群众，使大家又有了斗争的信心。在老君庙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孙津川同志说：“工人受苦，是由于团结还不够，从现在起，我们工人要团结起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两个字型，左手拿一个“工”字，右手拿一个“人”字，两个字并拢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他接着说：“只要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比天大，什么事都能干好，谁敢反对我们，我们就有力量消灭谁。”我们散发了许多小册子，揭露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其中有这样几句：“咱工人为革命心机用尽，凭赤手与空拳和敌人斗争，谁知道蒋介石心肠太狠，到如今变了脸屠杀工人，终日里在工厂替他卖命，既无衣又无食，饥寒难忍，卖香烟拣棉花样样事儿都做尽……”。

十二月四日，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浦镇附近一个山上秘密召开，参加会的有孙津川、罗世繁等二十多人，我的任务是放风。会后孙津川告诉我，我已被选为市委委员。这时，我感到身上的革命担子更重了。我们常去浦镇开会，我由于没有钱，多是走了去，有时晚上去开会，回来时天已快亮了，油条店都开炸了。

二八年四月底，市委在浦镇召开了一次布置红五月斗争的会议，有百把人参加，我们支部的同志没有全去。孙津川在会上布置我们在红五月里贴标语，散传单，准备暴动。这期间，我还配合孙津川处死了叛徒吴剑华。五月，市委在浦镇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孙津川、罗世繁、贺瑞麟等参加了会议，省委也派了一个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时因发现有可疑人向开会地点集中，只

好停止，大家分散走开。

那时的斗争生活确实很苦，可是同志们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孙津川家里很穷，每天只吃两顿稀饭，他出去工作时甚至整天吃不上饭。一次我生了病，又没钱找医生，孙津川给了我一块钱，叫我治病，安心休养，并说有困难可以找他想办法。他还送了许多书籍给我看。初夏时，孙津川穿着长衫出去工作，常常手上抓几个桃子当午饭，边吃边走。一次我碰见他，就向他提意见说这样太引人注目，孙津川笑笑说：“不要紧，我们的脑袋整天是提在手上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孙津川、贺瑞麟在姚佐堂家被捕，组织上对他们进行了营救，但没有成功。之后，交通员王雨田带了个姓庄的同志来见我，向我了解情况，要我停止活动。这时国民党内政部公开在报上通缉“在逃共党首领”罗世繁、滕炳炎、杜坤、梁长海等。形势险恶，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上面也没有消息。陈余生介绍我到石婆婆庙他表兄王起友家避风头，等待上级指示。快到年底时，听说孙津川、姚佐堂等同志牺牲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逃到了沈阳，在步枪厂当了工匠。三〇年后我又回到南京，改名何正泉，重新进入金陵兵工厂，当了钳工。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缅怀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友和同志。无数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让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干出一番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来吧。

（蒋晓星一九八三年四月访问整理）

中共江浦全工委的建立和工作^①

中共江浦县委党史办公室

江浦是建立党组织比较早的县份，约在一九二二年秋，浦口、浦镇就建立了党组织；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建立了中共江浦县特别支部。但党的组织一再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破坏。抗日战争开始时，江浦一度没有党的组织。

一九三九年一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政治部主任祁式潜同志及政治部民运工作人员宋超等来江浦开辟工作。他们随该团二营和三营在江浦境内活动，一方面组建江浦县抗日联合会，一方面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第一批发展了和县香泉进步知识青年张智锦和江浦石村庙农民乔正才入党。接着张智锦和乔正才两同志又各自发展了一些党员，如张智锦同志发展了离香泉不远的全椒赤镇花周村浦玉明等，乔正才发展了石村庙附近贫苦农民乔正义、曹明政、杜大劳等。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支队八团离开江浦及和县北部地区，祁式潜同志等也随之离去，张智锦、乔正义等同志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